

东盟文艺

统筹:寒川

第389期 新加坡篇

组稿人:寒川

顺天应命免烦恼

余平光



一般人认为,人生只要拥有物质享受,有车有房有钱,就是幸福快乐,如果再拥有权势地位,那就更好。庚子年的冠状病毒,让大家在汲汲营营地追逐金钱和地位的竞赛中,暂时停下脚步,自我反省。

我的朋友方女士感慨万千,她是苏拉威西锡江人(MAKASSAR),也是新加坡永久居民,疫情爆发之前就在新加坡,已经大半年回不了家。疫情带走了她的几个商场上的好友,令她最受的是曾经接到家乡友人的电话,奄奄一息地说:我很难呼吸!我很难呼吸!她在锡江享有名气,还开办三语学校,从幼儿园到高中,课程齐全。近年来,她开始放下身段,把学校转让了,也出售海外的产业,觉得知足很重要,能够返璞归真,了无牵挂,就是一种幸福。

闲暇时,我们有必要静下心来思考,在短暂的人生中拼死拼活,是不是明智之举?钱财物质,够用就好,功名地位,如过眼云烟。有的人热衷权势,耄耋之年仍然千方百计抢着要当领导;有的为了连任,不惜自我吹嘘,自我膨胀,抛弃科学,抛弃做人的道德底线。财富和权位真的能解决一切吗?昨天看到邻国首脑痛失38岁的二儿子的新闻,深刻体验到,钱财地位不是一切,我们若能不愧于天,不忤于人,无病无忧,心灵洁净,就有快乐和幸福。

午夜梦回,脑海中浮现着十几年前,在苏门答腊的巴东(Padang)乡下,目睹村民顺天命命的纯朴生活,他们并不富有,却能开开心心的过日子,不必陷于烦恼的泥淖之中,惶惶不可终日。

13年前,同事依士迈约我一起去巴东乡下,探访他的岳母。我们横渡马六甲海峡,到达北干峇鲁,而后越过中央山脉,来到西岸的巴东,那是他二老婆的家乡。他的二老婆去峇淡岛打工,家乡留下妹妹、母亲、佝偻的外婆,以及瘫痪的哥哥。她们的住家,是米南加保式的传统建筑,米南加保人的妇女是家庭的主导者,一切事物都由她们来安排。在那里,我充分体验到村民那种“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于我何有哉!”的生活。

依士迈的岳母手脚灵活,独当一面,做起家务来干净利落。她们并不富有,除了耕作的微薄收入,就靠依士迈夫妇的接济,儿子在雅加达遇车祸瘫痪回来,在经济上更是雪上加霜,但是,如果你以为贫穷与面对瘫痪的儿子,岳母一定是终日泪洗面,坐困愁城,那就大错特错。在她们家住了三天,没有看过妇人皱过一次眉头。

她们清晨五点钟就起来诵经祷告,而后开始一日的劳动,我站在稻田里抬头就可以看见火山。肥沃的耕地,丰富的土产,跑遍了整个村子,我看到的知足的面孔,感受到的纯真的心灵,人们接受造物者的安排,面对命运,没有埋怨,没有怪罪任何人。巴刹里尽是新鲜的蔬菜和香瓜,小贩们没有刻意招徕叫卖,更不会因为你外地人而抬高价钱。人们也没有因为频繁的地震而担心,他们已经和大地紧密地结合,天人合一,一切顺应自然,超然物外。

我顿时感觉到作为城市人的悲哀,我们一生都在想办法出人头地,投机钻营;都在想办法追求金钱物质,奔波劳碌,人与人之间互相猜疑,互相倾轧。我们的爱心,我们的付出,我们的气度,我们的胸襟,相较于巴东的村人,能不感到汗颜?

(26-10-2020)

《玉兰·茉莉》自序

朱亮亮

也许是巧合,日历上每逢十的整数的年份,似乎都有我生命中的里程碑。

1950年,我和哥哥随父母从新加坡迁往新中国。

1960年,我们又回到新加坡。

1970年,我大学毕业,隔年,修完荣誉学位。

1980年,我们一家离开南大教职员宿舍,搬到目前的住址。

1990年,事业进入冲刺状态,《星期二特写》启播。

2000年,我离开电视台,那年也出版了《北京三年》。

2010年,酝酿已久的家族百年历史《追虹》出版。5年后,大女儿把它英译成Chasing Rainbows。

2020年还没到来之前,我计划把过去10年在《联合早报》<外婆桥>专栏以及在旅游版上所发表过的短文长文集成书。没想到,一场世纪大瘟疫席卷地球,几乎让全世界停了摆。

初次和玲子传媒谈商出版《玉兰·茉莉》时,世界还是美好正常的。二月,瘟疫出现在新加坡,接下来,大家都提心吊胆过日子,防范冠状病毒成了每一个人生活中最揪心最重要的事。

当时,全世界都在抢口罩,一次性的手术口罩十分稀缺,有钱也买不到。

二月中,电视新闻报导有人开始缝制布口罩的第二天,我去买了一架最简单的缝纫机,重拾荒废了几十年的缝纫技术。从摸索到熟练,从简单到细致,几个月下来,我不停地为家人为朋友缝制口罩,乐此不疲。奇怪的是,在剪剪缝缝的过程中,母亲生前对缝纫的严格要求总是在我耳边响起。比如,线的颜色必须紧跟布料主色,车线线头必须用手打结避免外露等等。母亲后半生以缝纫立业,曾在香港开了个小型的家庭制衣厂。回到新加坡之后,她常给孙子们缝制睡衣睡裤,但从没教我缝纫。

在世界各地封城锁国的情况下,缝制口罩的布料和配件成了问题。还好,如今科技发达网络畅通,在孩子们的协助下,原料源源寄到,我一个人的工坊得以顺利运作,后来还迈向高端手工艺品销售平台。

转眼,2020年过了一大半,《玉兰·茉莉》还没定稿。于是放下其他杂务,整理写作心情,要在2020年留下另一个里程碑。在这本书的筹备阶段,我就设



下每一篇文章都要配上一张与题目相应的照片的目标。在此要感谢哥哥朱中华,正如他倾全力帮助我出版《追虹》一样,他翻找自己拍摄过的千百张精彩相片,为我补上许多相片空白。

一个前媒体人的晚年生活,点点滴滴加上所思所想,也许能为你增添一点阅读的情趣。

(您也可上网购买这本新书: choolianliang.com)

诗里江湖诗外诗

梁钺

——《诗外诗》自序

退休以后,写诗逐渐成为生活的一个重心。有一位友人说我这期间写得又好又多,所谓“好”,当然是过誉、激励之词;“多”,倒是不假,不过,这也是放在跟过去对比的基础上的。相较于过去,这些日子以来,产量的确有所增加,虽然年届古稀,一笔在握,诗作不断,自己也感到欣幸。有诗,岁月就不老,希望有一天,真的能做到友人所期望的:写得又好又多。

《诗外诗》是我第五本个人诗集,收录了从2008年至2019年的诗作计96首。这期间所发表的作品,除了这96首,另外尚有数十首,打算过一阵子再将它们另行结集出版。之所以作如是安排,主要是因为这本集子里的作品,性质都比较“另类”,编排在一起,相信能令读者读起来别有一番滋味。

96首共分五辑,以性质分,依次为:《题外诗》、《诗外诗》、《诗中诗:截句》、《武侠诗》及《法刀迷思录》。

《题外诗》有8首,皆采用古典诗词歌赋的题目(包含词牌、诗题、赋名等)为题,其中有二首分别在原题之上附加了“新”和“外篇”二词。这些诗以题设事,缘题抒情,正所谓旧瓶新酒,写的主要是现代的生活和感受。例如《秋声赋》原为欧阳修赋秋名作,我的《新秋声赋》写的却是秋瑾的电影,以“秋声”喻秋瑾的革命之声,让“肃杀之气”从字里行间涌出。又如《天净沙》,原为元曲曲牌名,马致远的古道西风瘦马,至今蹄声不绝,我却望题生义,把它写成了讽时刺世之作。更叫自己也哑然失笑的是《一半儿》,我竟把原本香艳缠绵的“一半儿推辞一般儿肯”,写成了严重塞车。如此写法未免大煞风景!而《上邪外篇》,虫声穿越花影,却偏又痴心得有如汉乐府民歌的续作。

《诗外诗》收短诗36首,均在12行以下。创作方式是断章取义,取古今诗人名句,缘情生诗,或针砭时事,或感时伤己,所采用的诗(词)句,从《诗经》,大小李杜到鲁迅和郁达夫,覆盖颇广,算是古今结合的一种尝试;在诗中,我刻意将这些古今名句置入新内容和思想感情,以及不同的美感经验,使之产生新的阅读愉悦。由于它们本质上是从名句所在的诗篇衍生出来的,故名“诗外诗”。以下这首根据陆放翁名句“不是人间偏我老”写成的短诗,体现了我导古入今,注今入古的努力:

一生名利
敲破了,半生熟
半世成就
搅一下,糖稀少

邻桌的早餐都相似
一杯咖啡
两枚鸡蛋
不是人间偏我老
——《偏我老》

《诗中诗:截句》所收的作品,全是四行截句。截句,亦名绝句,有人认为,近体诗的截句乃截取律诗中的精华四句而成,此种说法虽未必正确,但却也点出了截句短而精的特质。时下诗坛盛行的截句,形式一般在四句或四行以下,有两类:一是根据截句的要求,创作全新作品;一是从旧作中摘取其中1-4句,另篇成诗。我个人所作,迄今为止全为四行新篇,30首无一例外。我认为现代截句的创作,不能



一味超现实后现代,追求抽象的云来雾去,也应当效法古人写绝句,在短短四句里表达多彩、多层次的思想感情,甚至出奇招鲜活地反映客观现实,力求做到以小见大,自足圆满。我把这种想法落实到自己这30首作品中,“用波浪说话”,“在高烧的语境里连声咳嗽”,得到不错的反应。其中有半数收入卡夫主编、台湾出版的《新华截句选》。我相信如果能像现代诗当年一样,结合纵的继承,横的移植,截句必能上承旧体诗绝句的传统,下启现代短调之新章,绽放异彩。这方面天高地大,有待各路高手去努力开拓。

接下来要谈武侠,《武侠诗》与《法刀迷思录》两辑都属于武侠诗,不同之处在于,前者为短章,后者为长调。我与“武侠”结缘,始于念小学五年级,此后从未间断。于今垂垂老矣,空闲或烦闷时,仍不忘拿起那些发黄的小说温故而知新。一些经典名著,更前后读了七八遍,依然津津有味。

退休之前的几年,我在教育部工作,负责规划母语课程,适逢教改,我在所提呈的课程改革方案中,置入了武侠小说。做法有二,一是在中小学语文课程中,加入武侠小说;二是在中学的华文文学课程以及高中的文学名著选读部分,加入武侠小说。对于一向庄重保守,强调文道并重的华文课程而言,这无疑是天翻地覆的转变。

我认为本地学生语文水平不高,文学鉴赏能力也不及港台与大陆,大部分对古典文学望而却步,而武侠小说可以说是中华文学独有的奇门兵器,其他语种的文学即使有类似的作品,也如米粒之珠。说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人读武侠小说,殆无争议,雪山飞狐,萍踪侠影,真是无处不武,何地不侠。至于由之衍生出来的武侠电影,覆盖面之广,更是无远弗及。中华文学的这把奇门兵器,雅俗共赏,应该可以在教学上发挥其独特功能。弃之不用,形同自断一条经脉。

好的武侠作品,想象丰富,文化底蕴深厚,语言流畅精美,情节引人入胜,往往令读者一卷在手,废寝忘餐。在青少年还没能力欣赏阅读古典及纯文学之前,先引导他们透过阅读武侠接触文学,从俗文学入门,培养兴趣,加强文学鉴赏能力,等到具有相当能力之后,再引导他们进入技巧更高明的纯文学或典范古典文学,自然会水到渠成。就循序渐进的原则而言,武侠作品应该可以也必然可以成为教学上一个有效的台阶。效益为先,大可不必拘泥于雅俗之分。

再者,语文课程里所推崇的经典,如《西游记》、《水浒传》、《三国演义》等开始流传时也都是俗文学,说到情节荒诞离奇,《西游记》比之武侠,恐怕有过之而无不及;说到血腥残忍,诲淫诲盗,《水浒传》较之武侠恐也不遑多让。在选材上,固可择其合者而选之;在教学上,亦能择善固执,循循而善诱之,以此施教,有何不可?

我的总结是:做这样的规划需要极大的勇气,接受这样的规划,需要更大的勇气,并援引自己和其他同学的学习经验为证,以此说服评审委员以及各层级有司,过程中还得到不少“武林同道”见义勇为,拔刀相助,足见吾道不孤。结果,新加坡成了世界上第一个把武侠小说列为正式语文与文学教材的国家。

其时,中国的语文课程也开始重视武侠,不过只列为推荐读物。我曾就这点与中国同行交换意见,那是一次层级相当高的正式官方访问,有中国学者、专家在会议上对我们的做法大不以为然,理由是武侠小说绝不能与红楼、水浒等古典名著相提并论,它未取得典范地位,未获得学界及教育界的确认,情节荒诞,堂而皇之列为正式教材实为不妥。我以前述理由极力辩护,双方唇枪舌剑,僵持不下。最后,我惟有以国情不同来结束这场新中论剑。

在诗创作方面,以武侠入诗者,诗坛上不乏其人,但成系统地写而又成绩斐然的,首推台湾诗人罗青,其他诗人多偶尔为之,只有零星之作。可惜自《神州豪侠传》后,罗大侠便绝迹武林了。由于有罗青的珠玉在前,我写武侠诗可说战战兢兢,尽管如此,成果仍不尽如人意。所差堪自慰的是,记忆所及,罗青不曾写过长篇,而我却勉力写了一首长达593行的《法刀迷思录》。经过了为时数月的日夜煎熬,一改再改,诗是写出来了,成果如何,只能交给读者去评说了。

也不知为何,写诗写了超过半个世纪,不写一些武侠诗,心里一直有一种莫名的愧疚。如今潜下心“修炼”,终于写出一些武侠诗来,总算对武侠有个交代了。

1984年,我在《茶如是说》的后记里说:“那时候,书成了我的伙伴。从古典名著到被人目为左道的武侠小说,我都津津乐读,脑子里充满了激情与幻想,可是却无人把我引入文艺的道路,在这一方面,我无疑是比较不幸的。”当年,我曾为无人引领年少的我进入文艺的道路而感叹,如今,我却发现自己正身体力行,努力把武侠小说从左道引入文学正途。十多年来,历经课改的风风雨雨,武侠仍端坐在课程殿堂上,未被卫道之士拉下马,幸甚,幸甚,希望结论是武侠修成正果,而非我走火入魔!

最后,引两节诗作为本文的结束。第一节取自《诗外诗》,表明自己写诗的态度;第二节是武侠诗,象征自己对诗境界的追求:

胸中有乱山纵横
鸡鸣不已
笔,不能光说天气
——《风雨如晦》

突破自我如雷如电一以贯之
时空
碎裂
猛然响起一声鸡啼
——《长虹贯日》